

2702/

九龍坡文史資料

第五期



前 言

本期文史资料，专门辑录了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入川，在我区辖地上办厂开店的民族工商业及其以后发展的概况。

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时，我区被规划为工矿企业迁建区。“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到“八一三”淞沪战役前夕，日寇入侵日益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值此国难当头之时，沿海一带大批爱国的实业家、科学家和工商业者，为保全民间实力，支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历尽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阻，从沿海地区拆迁设备，抢运物资，内调资金和技术骨干，在大后方建厂经商。当时在我区投资建厂的就有上海的刘鸿生，宜昌的肖松立等著名的实业家、企业家。

抗日战争期间，沿海企业大搬迁，不仅避免了企业、物资落入敌手，以致资敌；而且改变了内地的封闭式自然经济结构，奠定了工商企业基础，发展了内地经济，为抗战胜利立了一功。

时过境迁达50年之后，我们辑录这本专题资料，除了扼要地再现昔日那壮烈而艰辛的历史画卷，实事求是地肯定民族工商业者在民族危难之际作出的历史贡献而外，同时也如实地再现了工人阶级在衣不裸身、食不果腹的困境下，拼命加紧生产，支援前方，为解救民族于危难自觉地作出了贡献

乃至牺牲，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在国民党反动派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悍然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他们面对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流氓打手的残酷镇压，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反内战”，“反迫害”，“争温饱”的斗争，为新中国诞生，作出了历史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国希望之所在。温故知新。在改革开放年代。重温这段历史，不无裨益。

民族工商业，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在帝国主义洋枪洋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列强从炮舰政策为主转向文化、经济侵略为主的逆境中，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的情况下，在中国大地的夹缝中艰难生长起来的。这个历史条件，造成了民族工商业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不壮。本辑中，从十里洋场的上海阔佬刘鸿生，到小作坊、小铺店的小老板，无一能够抗击得了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势力的压榨和掠夺。对于主张中国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的人，本辑也可以说是付清凉剂，引起他们重新思索。

迁入我区的民族工商企业，解放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全民所有制道路。当时的实业家、企业家们绝大多数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团结相处。解放后，他们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为我国新生政权的巩固，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作了努力，尽了责任。他们当中，有的成了各级政府或人民团体的领导人，肖松立曾任三届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鸿生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和工商联常委。40余年来，尽管我们有过失误，有过波折，发展也还不尽如人意。但所有这些企业长足发展的

成就，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成果，势头和前景，更是令人欢欣鼓舞。从恒顺机器厂到今日的水轮机厂；从豫丰机器厂到今日西南车辆制造厂；以及所有内迁厂的今昔变化。从改革前的三十年到改革后的十三年。历史事实在雄辨地告诉我们，中国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在于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历史经验中，从客观事实出发，得出这个历史结论，这是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由于客观上资料收集的困难和大多数作者政务冗繁，对一些史料和文字上的推敲都意犹未尽。加之我们编者水平不高，专辑不尽如意甚至错漏之处，都难免存在，我们诚恳的欢迎读者指正。

政协重庆市九龙坡区第四届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一九九二年十月

目 录

“沙市”迁重庆“荆州”誉西南	
——从沙市沙厂到重棉六厂·····	赵清善（1）
抗战中艰苦创业，重科技发展壮大	
——记重庆染料厂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	
·····	吴朝梁（20）
民族资本多浮沉	
刘鸿生与中国毛纺厂纪事·····	吕 奎（30）
地覆天翻慨而慷	
——重庆水轮机厂新貌纪略·····	秦四云（43）
几度沧桑展新容	
——重庆石棉制品厂兴衰史略·····	黎世明（49）
艰辛历程五十春	
——从三鑫纱管厂到重庆纺织器材厂简纪	
·····	曾 林（55）
峥嵘岁月 光荣历程	
——国营西南车辆制造厂今昔概貌	
·····	彭文仁 周桂森（64）
内迁重庆的冠生园	
——转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一书	
·····	俞少庵 肖宇柱（86）

“沙市”迁重庆“荆州誉西南

——从沙市纱厂到重棉六厂

赵 清 著

一、工厂沿革

重庆第六棉纺织厂原名重庆沙市纱厂，系1939年从湖北沙市迁渝建厂。

湖北沙市纱厂创建于1930年，由上海棉花商李玉山发起集资兴办。始名“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亦名“沙市纱厂”，系民族资本企业。

1939年抗战爆发，工厂被迫停工，内迁四川重庆。1941年5月在重庆九龙坡李家沱马王坪建厂恢复生产，名为“重庆沙市纱厂”。1953年、1955年先后与新裕、富华纱厂合并。1955年元月国家投资，成为公私合营企业。1966年初更名为“重庆第六棉纺厂”，1977年定名为“重庆第六棉纺织厂”。1988年根据重经企（88）67号文规定，兼并重庆远大织布厂，成为纺、织、染、整一条龙的全能纺织厂。

被兼并后的远大织布厂仍在原地（江北刘家台喜乐溪32号）生产，改名为“重庆第六棉纺织厂远大织染分厂”，厂部仍设在李家沱工矿路49号。现企业经营场所占地面积为10.16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占地面积为6.99万平方米，职工

生活区占地3.17万平方米，现有职工4592人，固定资产原值5127.51万元，其中环锭纺机5.3万枚，气流纺1000头，75吋宽幅织机264台，56吋窄幅织机72台，染整能力1000万米/年，帘子布700吨/年。经过多次技术改造，企业不断更新、发展，如今，已由过去的只生产纯棉纱的单纺厂发展为能生产棉、麻、丝、毛及各种化纤产品的多功能纺织厂，年产各类纱、线8000吨，色织布300万米。产品除供国内市场外，还经香港转销东南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产值达11000万元。从1955年以来，共创利税15533.99万元。1984年开始出口创汇、至1990年共创汇3640万美元，为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沙市纱厂从1941年5月迁入重庆建厂生产，至今有50年历史。半个世纪以来，经历了新旧社会两个不同时代的变化，历史公正地记录着她的荣辱兴衰。

二、内迁始末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共反人民，消极抗日，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1938年8月，武汉战局紧张，国民党军队开始从武汉撤退，过境日众，致使沙市地方一日数惊，人心浮动，风声鹤唳。10月26日，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28日，

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惊恐万状，以及原后方伤兵医院的撤离惨景，使沙市形势突紧，秩序混乱。沙市纱厂再也无法继续维持生产，于10月28日被迫停产，将职工发资遣散。

沙市纱厂在武汉失陷、停厂解散人员之后，经理肖松立和高级职员当晚登轮逃难宜昌，以观动静。经等待月余，日寇暂无西进趋势。当时，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抗敌剧团在沙市抗日宣传活动的影响，同时肖松立本人也系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人士，故在当时经济部工调处的部署下，逐酝酿利用战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将厂内迁四川，以免厂业落入敌手。内迁方案最后得到董事长杜月笙的赞成。

11月底，肖松立即筹划迁厂事宜，12月即组织人员不分昼夜抢拆机件40余天，将机件拆卸装箱编号。后机械装箱木板不够，乃到江陵农村高价收购门板代替。原棉1000余担及柴油引擎大件都抢运下河，分装大木驳9只，大铁驳4只和轮船1只，从沙市逆江而上，沿途几次险遇敌机扫射，押送人员担惊受怕。

1939年春，船只停靠宜昌。因轮船是敌机沿江轰炸的主要目标，故肖松立派专人与“上川帮”联系木船装运。为避免敌机轰炸，在晚上或清晨驶出三游洞，来宜昌载机件物资，共用木船111艘，计34批。其中11艘木船分别在三峡等险滩地带出事沉没，当即在出事地点立插标杆，以待冬季枯水季节打捞。经过5个月的艰辛抵达奉节，机件已损失30%，内迁损失费用46.12万元。

根据董事会决定，1939年5月，肖松立筹划在奉节西坪设

厂复工，调派人员清理机械和勘定厂基。不料，奉节西坪先后六次连遭敌机轮番轰炸，奉节县城毫无防空设施，西坪一条街炸为平地，致使百姓伤亡，房屋焚烧不计其数。所幸沙市纱厂内迁机件物资堆积在山脚下，未遭重大损失，但拆迁人员却被炸死、炸伤各2人，百姓逃难一空。虽肖经理一再筹划，然而敌机轰炸不断，复工计划终告失败。

当年11月10日，第七届第三十三次董事会议研究了肖松立经理在10月27日以来三次自渝来函建议在重庆复工的方案。据当日会议记载：“肖在渝晤杜董事长敦促复工，俾增加后方生产。奉节地方不宜设厂：（一）、近来奉节连续被炸6次，毫无防空设备。（二）、熟手工人太少。（三）、上下轮渡不停。故为今之计只有迁机渝郊自行复工。其优点：①有积极之防空设备。②交通较便。③同业均已开工，招收熟练工人较易。④一切添配较便。⑤销纱较便，消息较灵，并将纱锭分作两厂，如能投保轰炸险时，不惜费用准定投保避免危险也。惟地基、原动力、运费、复工经费等均有困难，请董事会速决大计。”最后议决：“接受肖经理建议，先迁锭子数千至渝复工，所有运费、原动力、地基等请求政府协助。”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决定初期在重庆复工6000锭。肖松立即筹划重庆建厂事宜，数次到重庆联络经济部和调整处，向纺织界和地方人士筹款征地，为基建迁机打下基础。

4月初，重庆沙市纱厂厂址选定在重庆南岸、李家沱、马王坪，因一是交通方便，临江可赖长江航运，修理短距离的公路可与其他公路衔接，陆运便利；二是可在沿江削壁处开凿

防空设施，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4月14日，厂房基建工程在马王坪择地80亩破土兴建，分作一期厂房工程，二期库房、办公室、职员宿舍工程，三期工人宿舍、教室饭厅、合作社工程进行施工。1940年年底，各期基建工程大体建成。

旧中国的沙市纱厂在日寇铁蹄下被迫停产，人员遣散，各自奔波流离，逃命避难，厂机几经辗转拆迁、沉水被炸、生命财产损失重大，深刻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三、惨淡经营

沙市纱厂被迫内迁重庆，董事会机构未变，董事长仍为杜月笙，经理仍为肖松立。因内迁经费损失1000万元之多，流动资金全部耗用殆尽，复工资金十分困难，只有设法陆续向经济部借款80万元，四职总处100万元，其他借款50万元后方能复工生产。

1940年底厂房落成，首批设备6400锭工艺设计由肖松立经理完成，组织内迁技工等完成安装。设备安装后，利用沙市厂解散后自行入川的部份女工和来川后招收的“养成工”，1941年5月正式开车，在简陋分散的厂房中恢复了生产。半年后，又从奉节清理运来5200锭，1942年安装4400锭，实开10800锭，1943年开齐11600锭。1947年用棉纱向中国汽车制造公司调换“司马来”细沙机锭2000枚，到1949年，重庆沙市沙厂实开12400锭，有职工1450人。

重庆沙市纱厂开工，正值抗战。为维护战时经济，国民政

府对棉纱、布匹实行严格管制。1942年2月，经济部物资局成立，先后限令登记渝市纱、布存量，严格限制纱、布移动，使厂家处处受限。1943年1月，又成立花纱布管制局，对花、纱、布实行全面控制。9月24日，财政部对豫丰、裕华、沙市、申新等厂作出了管制的硬性规定，迫使在渝各纱厂成立同业公会，恳求政府增加企业留利，突出反映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国民党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家的控制与掠夺，反映了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矛盾。为与官僚资本抗衡，1939年下半年，重庆各纱厂为对付国民政府指派军纱，控制花纱布及开抑物价等问题，决定每周一次聚餐会共同商量对策。1945年4月，因原棉欠收，各厂减产50%。同年11月，花纱布管制局撤销，停止供应棉花。为解决原料问题，重庆沙市纱厂又与豫丰、裕华、申新、中纺五厂成立购棉委员会，主要购买美国棉花。由于原料短缺和沿海及美国货的进入，沙市纱厂与重庆其他纱厂均已处于半开半停状态。

在沙市纱厂内部，为抗衡官僚资本的控制和掠夺，兴办了一些职工福利，如供膳宿、办学校、医务室、工伤治疗等，将福利费用摊入成本，籍以提高棉纱工本费用，增加股东利润和缓和劳资矛盾，安定情绪，使企业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故沙市纱厂的“荆州牌”棉纱品质优良，为重庆四大纱厂之一。售价虽比同行业厂高出一成左右，仍受广大用户欢迎，享誉西南各地。

抗战胜利后，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纱厂与纱商之间实行以货易货，并受长官公署市长、警、宪、税局等以官价摊派纱、布、棉花的层层盘剥。1949年，国民政府金元券

改为银元券，市面混乱，物价一日数涨，售出棉纱购不回相应原料，形成虚盈实亏，很多时间只有用棉纱向银行抵押贷款为流动资金，勉强维持生产。当时，仓库门前经常挂着银行押款牌子。更甚的是“九、二”火灾把堆放在朝天门仓库的原棉全部烧毁。重庆解放前夕，沙市纱厂已濒临停产。

四、老厂复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为沙市老厂复员、恢复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沙市是产棉地区，产、销集于一地，地理自然条件优越于重庆，而且沙市有不少老工人，有厂址厂房基础，奉节又存有纱锭8400枚，复工快、收益有把握。出于对更多利润的追逐，上海董事会在抗战胜利后即酝酿沙市老厂复工。

1941年至1945年，重庆沙市纱厂在未得到上海董事会拨款的基础上，六年来创造剩余价值除归还建厂时的贷款及利息外，积累资金计黄金2000两（还有3000两被官僚资本掠夺），银元15000元，美金储蓄10万元，棉纱400—500件，棉花近10000担，对沙市老厂复工打下了较强的物质基础。

1945年10月6日，肖松立派员到沙市接受厂址和产权。1946年7月9日，上海董事会改组，经推选杜月笙仍为董事长，高介人、金宗城、杨渔笙、肖松立四人为常务董事。董事会议决奖励赠送肖松立股权，从此肖松立由1934年10月至1946年7月的聘任经理变为常务董事、主要股东之一。同时决定，沙市厂复工由肖松立全权负责进行。沙市老厂复员

后，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下分为两个分厂：渝厂和沙厂。肖松立被任命为渝、沙两厂总经理，副经理为高鹏九；1949年沙厂又增任襄理杨敷德，成为沙厂厂务实际负责人。

沙市老厂复工除修复存放于奉节陈旧纱锭8400枚安装生产外，并购买英国20000锭新机，所有复工费用全部用重庆沙市纱厂积累的资金开支。1953年1月1日沙市纱厂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沙市纺织有限公司”。从1954年起，即将私股实际上转作重庆沙市纱厂对湖北沙市纱厂的投资。

1966年9月，沙市厂更名为“沙市向阳纺织厂，”亦称“向阳纱厂”，1980年正式定名为“沙市第一棉纺织厂，”简称“沙市一棉”。

沙市纱厂的建立和恢复，使江汉平原有了第一座现代纺纱厂，开原棉产地办纱厂之先例，创沙市纺织工业之开端。纺织工人队伍随之发展壮大。解放以来，特别是1953年企业公私合营以来，沙市纱厂经过六次改造和扩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已成为拥有纱锭7.4万枚、线锭1.7万枚、布机304台、化纤抽丝设备1000吨/年一套，职工4300人的大型纺织企业，成为培养输送纺织专业人才和地方工业骨干的基地，为沙市纺织工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沙市纱厂于1930年兴建至1949年沙市解放获得新生，历经创建、衰败、复苏、内迁、复工等发展阶段，历时19年。历史证明：沙市纱厂兴建、内迁在当时民族纺织工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沙市纱厂兴建初年所拥有的纱锭，占当年华商纺织工业新增纱锭的18.47%，占全国华商纺织工业

所拥有全部纱锭的0.86%。沙市纱厂的兴建是民族纺织资本撤离上海等旧有中心而向内地分散，以抗衡帝国主义资本的压迫与侵略这一趋势的开始与重要标志。沙市纱厂的创办为郑观应、李鸿章于1890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来的第110个民族资本纺织企业。

五、三厂合并

新裕纱厂，1947年春建于重庆南岸道角，注册“地球牌”商标，生产21支棉纱。1949年因物价飞涨，形成虚盈实亏。1950年开齐7200锭，职工约380人。

富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华纺织厂）1940年筹建于重庆南岸大佛寺，初仅职工20余人，纱锭168枚，注册“山城牌”商标，主要生产20支棉纱。后又筹办脚踏织布机12台，至1949年能开齐800锭，日产20支棉纱约一件左右，职工60余人。

1953年6月，西南纺管局鉴于新裕纱厂规模小成本高，提出沙市、新裕两厂合并经营建议。两厂董事会及劳资座谈会研究同意，于1953年7月1日签订并厂合同。至11月中旬迁装机器工作基本完成，当年两厂生产都按月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

1955年3月17日，西南纺管局及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业局批准私营富华纱厂全部资产投入重庆沙市纱厂。4月1日，公私合营后的重庆沙市纱厂股份有限公司接受私营富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并经营。

三厂合并经营，扩大了生产规模，设备增至22000锭，职工达1959人。针对并厂后机器类型多、不利生产的情况，加快进行了老机改造，统一设备规格，适应生产需要，从而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了职工物质文化生活，职工疗养所、俱乐部、托儿所、子弟校等集体福利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六、改造扩建

1958年至1959年，经四川省轻工业厅批准，我纱厂进行扩建1万锭工程，厂仍扩建2542平方米，新增490人，工程实际投资128.27万元，其中西南纺管局自筹6万元，企业自筹6.12万元，国家投资116.12万元，企业固定资产增值91.98万元。

1970年，市纺织工业公司革委会向省纺织局紧急报告，为解决橡胶工业生产各种军用、民用轮胎急需的帘子布就地配套，安排在重棉六厂扩建一个年产4000吨的帘子布车间。1971年，省市下达计划，要求我厂生产备战急需的帘子布。厂里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方面积极筹建帘子布车间，另一方面土法上马，用从重庆帆布厂调来的36吋布机改装为帘子布机。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奋战，终于改装成功，于5月10日投入生产，织出了基本合格的帘子布，向党的生日“七、一”献礼，填补了西南帘子布生产的空白，同时也为新建帘子布车间培养了骨干。同年12月14日，又成功地将36吋宽的帘布机改装为51吋宽的宽幅帘布机，当年简易生产帘子布

47.28吨。

1971年6月，市轻工局下文批准纱厂扩建年产帘子布1200吨工程。1971年7月1日至10月13日，完成新建帘子布车间1490平方米，可年产帘子布600吨的一期工程，实际投资88.77万元，固定资产增值95.7万元（另600吨帘子布工程因国家布局变化未能续建）。当年底，帘子布主机设备安装就绪，但因机配件延缓到厂，故1972年春节后新车间开始投产。

从1965年到1968年，企业先后新增3744锭和3328锭，至1972年陆续开齐，企业规模扩大到35856枚纱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迎来了盼望30多年的老厂危房改造扩建工程。经市计委（78）1114号、市工交部（78）165号文联合批准，同意纺场危房改造工程按5万锭规模一次设计分期施工，市纺织局（79）423号文批准我厂挖潜扩建1.5万锭。

1979年12月19日，“老改”工程正式开工，1982年12月底，27992平方米厂房建成。铸工车间572平方米、原棉仓库2215平方米、女单工宿舍3229平方米、冷冻站等配套工程至1984年先后完成，沱六专线10千伏在1981年9月21日建成通电，整个工程历时5年半。

“老改”一期工程新增设备408台（其中通用设备227台，纺专设备181台）。自1981—1984年，工厂依靠自己的设备队伍，安装了新增的当时国产最新型A513C型细纱机1.5万枚一条龙的纺纱设备和更新的A513MA中长2万枚纱锭一次试车成功，达到工艺效果、部件质量、维修机台、维修技术、满意机台五个新水平，纺专设备一等级车率达

100%，通用设备安装合格，使用满意，为六棉的奋起创造了优势。

七、发展创汇

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推行，1984年以来，企业生产经营瞄准国际市场，大搞技术改造和技术储备，不断开发新产品，彻底改变了以往生产纯棉低支纱的老面孔，不仅开发了中长化纤纯纺和混纺产品，而且突破行业界线，利用棉纺设备开发了羊毛、兔毛混纺产品，尤其是开发出国际市场走俏的苧麻混纺和纯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86年继续开发出麻棉混纺花式线出口系列产品。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享有较高声誉，为国家创收大量外汇。计1984—1990年创汇3640万美元。为此，我厂自1984年来多年荣获“新产品开发先进单位”称号，1987年荣获国家经委颁发《“六、五”技术进步先进企业》单项奖，经市府命名为重庆市首批出口产品生产专厂，1988年经省、市批准取得“出口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出口产品质量许可证”，从1985年保持了市府命名的“双文明企业”称号，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建国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厂得到飞速发展。遵循“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调整经营策略、产品结构、管理机制为重点，紧紧依靠和发动全厂职工，严格管理，灵活经营，老厂焕发了青春。